

佛教之初輸入

外來之佛教，曷爲而能輸入中國且爲中國所大歡迎耶？輸入以後，曷爲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？此答案非求根柢於歷史焉不可也。

今吾所首欲討論者，第一爲佛教最初輸入年代之問題；第二爲最初輸入地之問題。

『漢明帝時，始有佛法』。（韓愈諫迎佛骨表語）此二語殆成爲二千年來公認之

史實。吾人心目中，總以爲後漢一代，佛教已粲然可觀。乃參稽考證，而殊覺其不然。（說詳下）後漢書西域傳論云：『至於佛道神化，興自身毒；而

二漢方志，莫有稱焉。……騫超無聞者，豈其道閉往運，數開叔葉乎？

據此足證兩漢時人，鮮知有佛。官書地志一無所載。學者立言，絕未稱引。王充者，後漢學者中學識最賅博而最富於批評精神之人也。其所著論衡

，對於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，無一不加以批判矯正。獨於佛教，未嘗一字論列，此即當時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證。故語佛教之初紀元，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爲斷，但前此史蹟，於此間消息，固亦有可窺一二者。

其一：朱士行經錄稱『秦始皇時，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，賁佛經來

咸陽，始皇投之於獄』。

（歷代三寶記卷一引）

此經錄本不甚可信；此種斷片且

傳疑的史實，似無徵引之價值。但最當注意者，秦始皇實與阿育王同

時。

（秦始皇西紀前二四三——二一七）

（阿育王西紀前二六六——二三〇）阿育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

人於各地，其派在亞洲者，北至俄屬土耳其斯坦，南至緬甸，俱有確

證。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，

（法人拉伯克里考據此事頗詳）

然則育王所遣高

僧，或有至中國者，其事非不可能。

（佛門掌故，稱育王起四萬八千塔，其二在中國。此雖荒

誕，然或是一種暗示。）

但藉口有之，然既與當時被坑之儒同一命

運，則可謂與我思想界沒交涉也。

其二：魚豢魏略西戎傳云：『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』（三國志裴注引。魏書）此事在歷史上雖爲孤證；然其時大月氏王丘就卻，正征服罽賓；而罽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。則月氏使臣對於佛教有信仰，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，從而問業，亦意中事。但既無著述，亦無傳授，則影響固不及於思想界耳。

其三：後漢書楚王英傳云：『英晚節更喜黃老學，爲浮屠齋戒祭祀。永平八年，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縲纁。英……奉送縲帛贖愆。……詔報曰：『楚王誦黃老之微言，尙浮屠之仁慈。潔齋三月，與神爲誓。何嫌何疑，當有悔吝？其還贖以助伊蒲塞』（即優婆塞）『桑門』（即沙門）之盛饌！因以班示諸國』。此爲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。中國人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，自當以英爲首。然以帝子之尊（英爲光武子）而服其教，

則在社會中先已植有相當之根柢可知。故教義輸入，不得不溯源於西漢之季也。

其四：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：「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」。此語見諸奏牘，必爲事實無疑。帝王奉佛，蓋自此始。此蓋在永平百年後矣。

漢明之永平求法說，大略謂明帝感夢金人，遣使西域；賁還經像，創立寺宇。今藏中四十二章經，卽當時所譯；魏晉後之洛陽白馬寺，卽當時所建。甚者演爲釋道兩教競技劇譚，謂佛教緣此盛弘京邑。雖然，試稍用嚴正的史識一繩之，則茲事乃支離不可究詰。蓋當時西域交通正中絕，使節往返，爲事實上所不可能。卽茲一端，則此段史蹟，已根本不能成立。其所宗據之四十二章經，察其文體，案諸經錄，皆可斷爲兩晉間人作，絕非漢時所有。至於各書關於茲事所紀載，其年月；其所遣之人；所居之地

；所作之事；無一從同，而矛盾罅漏隨處發現。故以吾之武斷，直謂漢明求法事，全屬虛構。其源蓋起於晉後釋道鬭爭；道家捏造謠言，欲證成佛教之晚出。釋家旋采彼說，展轉附會，謀張吾軍。兩造皆鄉曲不學之人，盲盲相引，其先後塗附之跡，歷然可尋。治佛學史者，須先將此段偽掌故根本祓除，庶以察思想進展之路不致歧謬也。

（附錄一）漢明求法說辯偽

漢明求法說，最初見者爲西晉王浮之老子化胡經。王浮蓋一妖妄道士，造爲老子出關西度流沙之說，指彼佛陀爲老子弟子者也。其書經六朝唐數次禁燬，稍有識者皆知其妄，獨所造漢明求法說，反由佛教徒爲之傳播，洵一怪事也。其述此事概略云：

『永平七年甲子，星晝現於西方，明帝夢神人。因傳毅之對，知爲胡王太子成佛之瑞應，卽遣張騫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衛。值佛已涅槃，乃寫其經，以永平十八年歸。』

此種記載之荒謬，一望而知者，莫如張騫姓名。蓋以二百年前之人物，插入此劇本中，其固陋太可憐矣。但尤有極強之反證，爲世人所罕注意者，則西域交通之歷史也。考後漢書

西域傳云：

『王莽篡位，貶易王侯，由是西域怨叛，與中國遂絕，並復役屬匈奴。……永平中，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，城門盡閉。十六年，明帝乃命將帥北征，……遂通西域。……西域自絕六十五載，乃復通焉。』

此紀西域通絕年歲，謹嚴詳明。永平七年，正西域受匈奴構亂猖獗之時；下距十六年之復通且十歲，安能有遣使經三十六國入印度之時。其不學杜撰，正與攀引張騫同一愚謬耳。卽此一反證，而漢明求法說，已根本推翻，無復成立之餘地。

然則王浮曷爲造此說耶？彼不外欲證成其佛陀爲老子後學之說，因佛經中言佛出世，成道，涅槃，皆有六種震動等瑞應，因謂恆星晝現，爲佛成道之象，強派佛陀爲漢明帝時人耳，故又言漢使至而佛已涅槃也。然則彼又曷爲必託諸明帝耶？則永平八年賜楚王英之詔書，爲其作僞取資之動機，殆可斷言，蓋此詔書，必爲當時佛教徒所最樂稱道，因此不知不覺間，將漢明帝與佛敎生出關係；僞造故實者，遂因而託之。殊不思彼詔書中，「浮屠」伊蒲塞「桑門」等新名詞已疊疊滿紙，豈待聞傳敎之對而始知世間有所謂佛耶？

其次踵述此說者，爲東晉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議，有「漢明感夢，初傳其道」二語。

（見高僧傳卷十佛圖澄傳）又次，則袁宏後漢紀（卷十）云：

「帝夢見金人，長大，頂有日月光，……而問其道，遂於中國圖其形像」。

其言皆極簡單，不過姑沿俗說而已。又次，則四十二章經記此事漸鋪張擴大矣。此記見梁僧佑出三藏記卷七，注云「未詳作者」。然四十二章經，實吳晉間人偽作，（詳下）其記又當在經後，殆出東晉無疑。記云：

「昔漢明皇帝夜夢見神人，……明日問羣臣，有通人傅毅對曰：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，……殆將其神也。於是上悟，即遣使者張騫羽林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至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，在十四石函中」。

此記當注意者，則於「使者張騫」外，添出秦景王遵等十二人，又所寫經有四十二章之目，奉使之地，乃易印度爲月氏，殆作此記者較博雅，知張騫僅曾到月氏，未到印度，故毅然矯正前失耶？秦景之名，蓋影射受經伊存之博士弟子秦景憲而漏卻一字，又誤記其官，而別造一博士弟子名王遵者。實則羽林郎將，漢家並無此官名也。

復次，踵此記而增飾之者，則牟子理感論也。此論見弘明集卷一，舊題漢牟融撰，實則東晉劉宋間人偽作。（詳下）其敘此事，前半全同四十二章經記，惟改秦景官名爲羽林郎中耳

。然此官亦非漢所有也。下半則內容更加擴大。其文云：

「……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，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。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，起立佛寺，於其壁畫千乘萬騎，繞塔三匝。……」

前記稱「寫取經在十四石函中」，似是指經在彼土藏以石函，至是則忽變為蘭臺石室第十四間矣。前諸書只言迎取經像，至是則言立寺洛陽，且指其地點矣。復次，則梁僧祐出三藏集記（卷一）四十二章經條下云：

「……使者張騫，羽林郎中將秦景，……於月支國遇沙門竺摩騰譯寫此經，還洛陽，藏在蘭臺石室」。

此文與前異者，前書只言「寫取佛經」，至是則寫本變為譯本，又於使節之外，忽添出一同來之竺摩騰，求法之成績，益增上矣。及梁慧皎作高僧傳時，「漢明求法」之傳說，又生變化。其攝摩騰傳云：

「漢永平中，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，愔等於彼遇見摩騰，要還漢地」。

竊思彼時佛徒歷史之學乃驟進，居然知張騫與明帝並不同時，急急抽換，乃杜撰出蔡愔

其人者以爲代。惜爲大使，不可無官也；卽以副使之官官之。又覺羽林中郎將爲武職，非求法使臣所宜也；則刪削頗之爲「郎中」。其尤淹博可佩者，居然更知歷年派充副使之秦景，其職業實爲博士弟子，亟爲之正名定分，而將隨員中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。所惜者，秦博士向伊存受經時，上距永平已七十餘歲，垂老而遠行役，未免不情耳。然以較舊說，則已周密數倍。後此魏書老志歷代三寶記等，皆祖述之。遂成爲佛門鐵公案矣。高僧傳又云：

「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」。（攝摩騰傳）

「蔡愔至中天竺，時竺法蘭與摩騰共契遊化，遂相隨而來。會彼學徒留礙，闕乃間行……達雒陽，與騰同止。……善漢言，譯十地斷結……四十二章等經五部」。（竺法蘭傳）

使臣歸國之結果，初但言實還經像耳，第二步變爲立寺，第三步則寺所在地點，第四步則並寺名而有之矣。初則言使臣獨歸，第二步添出一譯經之摩騰，第三步又添出一法蘭，第四步則法蘭譯經且多種矣。凡此皆作偽進化之跡，歷歷可尋者也。

漢法本內傳者，見唐道宣所撰廣弘明集卷一，注云：「未詳作者」。勘其事狀及文體，蓋出於元魏高齊釋道安最烈時。其述此事，益極荒誕。略言：

「蔡愔偕摩騰法蘭歸，道家積不能平。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，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，

抗表請比對。其月十五日，明帝集諸道士於白馬寺，使與騰蘭二人賽法。道經皆焚燼，騰等現種種神通，道士費叔才慚死；呂惠通等六百餘人出家，宮嬪等二百三十人，士庶千餘人出家。

嗚呼！作僞至此，歎觀止矣。信如法本內傳所說，則當時出家者已盈千累萬，而三百年後王度奏事，乃謂漢魏之制，除西域人外不許出家，此等語安能形諸奏牘？信如高僧傳所說，則摩騰法蘭已大興譯事，而下距安世高之來，垂百年間，無一新譯；佛徒之辱其宗，不亦甚耶？

綜以上所考證，吾敢斷言曰：漢明求法，乃一羌無故實之談。其始起於妖道之架誣，其後成於愚禿之附會，而習非成是，二千年竟未有人敢致疑焉。吾所以不能已於辯者，以非將此迷霧廓清，則佛教發展之階段，無由說明，而思想進化之公例破矣。其有舛失，願來哲匡之。

（附錄二）四十二章經辯僞

藏中本經，標題云：『佛說四十二章經後漢迦葉摩騰同竺法蘭譯』。高僧傳云：『漢地見存諸經，唯此爲始』。此語蓋二千年來佛徒所公認。摩騰之姓，或作竺，或作攝，或作迦

葉。此經或云摩騰譯，或云法蘭譯，或云騰蘭同譯。兩人籍貫，或云月支，或云天竺。此皆枝末異說，未有從根本上致疑於其僞者。如吾前文所考證，漢明求法，既光無故實，騰蘭人，皆子虛烏有，則此經託命之點，已根本動搖。然則此經果何時代何人所作乎？此問題向佛典目錄學中求之，或可解答一二也。

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（省稱長房錄）本經條下云：

『舊錄云：「本是外國經抄，元出大部，撮要引俗，似此孝經十八章」。……』

此言此經性質最明瞭，蓋並非根據梵文原本比照翻譯，實撮取羣經精要，摹仿此土孝經老子，別撰成篇。質言之，則乃撰本而非譯本也。然則誰實撰之耶？吾以教理及文體衡之，則其撰人應具有下列三條件：（一）在大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頗通大乘教理者。（二）深通老莊之學，懷抱調和釋道思想者。（三）文學優美者，故其人不能於漢代譯家中求之，只能向三國兩晉著作家中求之。

現存經錄最古者，爲梁僧祐之三藏集記。（省稱祐錄）四十二章經之著錄，即始於彼。

原注云：

『舊錄云：「孝明皇帝四十二章」。安法師所撰錄，闕此經』。

安法師者即道安，其所撰錄，即所謂安錄是也。（今佚）此經既不著於安錄，則可斷言爲道安所未見。蓋安錄記載極博，雖疑僞之經，猶不闕遺，苟其見之，必當有所論列也。道安與苻堅同時，安既不見此經，則其出固當在東晉之中晚矣。但猶有一事當注意者，祐錄長房錄中所引「舊錄」，爲何人所撰？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後？若能得其出處，則四十二章之時代可以大明，因此又當牽涉及「經錄研究」。據長房以後諸書所引，有曹魏朱士行著漢錄，其書若真，則年代在安錄前。然以僧祐博極羣書，何以於此漢錄一無徵引？高僧傳道安傳云：「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，而傳之人，名字弗說；後人追尋，莫測年代。安乃詮品新舊，撰爲經錄，衆經有據，實由其功」。

然則安以前並無著經錄之人？士行安錄之僞託蓋不待辯；而此所謂「舊錄」者斷非士行錄，更不待辯。然則道安以後僧祐以前之經錄共有幾種耶？據大唐內典錄所記，有東晉竺道祖衆經錄四卷；有東晉支敏度經論都錄一卷，別錄一卷；有蕭齊王宗經錄一卷，此所謂「舊錄」者，不能出此三種以外。又考祐錄同述達經大六向并經兩條下引「舊錄」，長房錄所引文全同，而稱爲支錄；則凡僧祐所謂「舊錄」，殆即支敏度之經論都錄。若吾所推定不謬，則四十二章之著錄實自支錄始矣。支敏度履歷，據內典錄云：「晉成帝時豫章沙門」，其

人蓋與道安同時；但安在北，而彼在南，然則此書或即其時南人所僞撰，故敏度見之而道安未見也。敏度又嘗將首楞嚴經維摩詰兩經諸家舊譯，彙而抄之；其序見祐錄中。然則敏度蓋有抄經癖，所謂一撮要引俗一者，實其專長，或此經即出敏度手，亦未可知也。

尤有一點應注意者：長房錄於支謙條下，亦列有四十二章經。注云：

「第二出，與摩騰譯者小異，文義允正，辭句可觀。見別錄」。

此別錄即支敏度之衆經別錄（其他經錄，無以別名者）。然則度所編集，有兩本矣。此經理趣文筆，皆與支謙諸書，系統相近，指爲謙作，亦近情理。

要之此書必爲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，作者必爲南人而非北人；其年代，最早不過吳，最晚不過東晉。而其與漢明無關係，則可斷言也。

今當研究佛教初輸入地之問題：——向來史家，爲漢明求法所束縛，總

以佛教先盛於北。謂自康僧會入吳，乃爲江南有佛教之始（高僧傳卷一）。

其北方輸入所取途，則西域陸路也。以漢代與月支間實交通之跡考之，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，絕無影響。但舉要言之，則佛教之來，非由陸而

由海；其最初根據地，不在京洛而在江淮。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，卒歸失敗；然非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。蓋漢代黃支，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志補羅國。（Kanchipura）時以廣東之徐聞合浦為海行起點，以彼土之已程不為終點，買船轉相送致。（注一）自爾以來，天竺大秦貢獻，皆遵海道。（注二）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。其與南方佛教之關係，蓋可思也。

（注一）漢書地理志云：「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（案皆今縣名）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國；又船行可四月，有邑盧沒國；又船行可二十餘日，有詭離國；步行可十餘日，有夫甘都盧國；自夫甘都盧船行可二月餘，有黃支國。……自武帝以來，皆獻見，有譯長。……蠻夷買船，轉送致之。……平帝時，王莽厚遺黃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。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，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。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；漢之譯使，自此還矣」。右所列國名，除黃支外，皆難確考其今地；大約皆在南洋羣島錫蘭及南印度境也。官書中紀其行程，則交通已頗頻繁，蓋可想見。考中國對外關係之沿革者，最當留意也。

（注二）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條下云：「和帝時數遣使貢獻，後西域反畔，乃絕。桓帝延熹二年四年，頻從日南徼外來獻」。又大秦國條下云：「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」。安敦即羅馬皇帝 Antony 也，此皆中國海通最古之史蹟。

楚王英奉佛，固屬個人信仰，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，蓋有不可認者。我國南北思想兩系統，在先秦本極著明，北方孔墨之徒，雖陳義有異同，然其重現世貴實行則一。南方自楚先君鬻熊，相傳已有遺書，爲後世道家所祖。老莊籍貫，以當時論，固南人也。其治學則尚談玄，其論道則慕出世。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，其思想之表現於遠遊諸篇者，亦與老莊極相近。蓋江淮間學風與中原對峙，由來久矣。西漢初淮南王安，受封故楚；與其地學者蘇飛李尚輩講論，成淮南鴻烈解傳於今，集道家言之大成焉。然則在全國各地方各民族中，惟江淮人對於佛教最易感受，對於佛學最易了解，固其所也。中印交通樞紐，本在廣東；但其時粵人太蒙昧，未能任

此高尙教理之媒介。漢武平南粵後，大遷其人於江淮；（漢書南越傳）此後百數十年中，粵淮間交通當甚盛。故渡海移根之佛教，旋即播時於楚鄉，此事理之最順者。而楚王英奉佛，卽此種歷史事實最有力之暗示也。

尤有一事當注意者。後漢書陶謙傳稱：『丹陽（今鎮江）人笮融，在徐州廣陵（今揚州）間，大起浮屠寺，上累金盤，下爲重樓。……作黃金塗像，……每浴佛輒多設飲飯，布席於路，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』。融與曹操同時，其人爲南人，其所治地爲南土。其時佛塔之建造，佛像之雕塗，佛徒之供養，如此奢麗；此雖半由本人之迷信，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，謂其不受社會環境幾分之示唆焉，不可得也。

楚王英前後之佛教，度不過極粗淺之迷信譚耳；於後此教宗之建設，不能謂有多關係。其真爲佛教理的輸入者，不得不首推安世高。世高爲譯經之第一人，其書傳於今者，真僞合計，尙三十餘種，其爲中國佛教開山

之祖，固無待言。舊說皆謂世高譯業在洛陽；然按諸高僧傳本傳，則世高在廣州在豫章在荊州在丹陽在會稽皆有遺跡，淮以北則無有。（注二）且高襄譯者；實臨淮人嚴佛調。（注三）以吾之武斷，竟欲謂高譯諸經，皆南方也。倘以上所推測不甚謬，則我國佛教，實先從南方得有根據，乃展轉傳播於北方，與舊籍所傳者，適得其反矣。

（注一）安世高傳記，幾純屬神話的性質，頗難悉認為史料。即其年代，非無可徵信，一通常之說，謂為漢桓帝時入中國。然有謂晉時猶生存者，又有謂彼前身死於廣州，再世為安息王太子重來中國者。高僧傳博采衆說，言世高曾兩到廣州；曾往廬山度鄒亭廟神；曾在荊州城東南隅立白馬寺，曾在丹陽立瓦官寺；最後卒於會稽，其史蹟多詭誕；不可盡信。然以情理度之，世高蓋從海道來，在廣東登岸，經江西北上，而在江淮間最久。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，故到處有其神話也。世高原籍安息；（今波斯）時中印海運業；皆在安息人手。世高遵海來，最近於事實。

（注二）嚴佛調所襄譯事，或云安世高，或云安玄，然吾頗疑並無安玄其人者，或即世高